

# 降物流成本比个税减负更能促内需

本报评论员

眼下，以“菜贱伤农，菜贵伤民”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民生窘相为由头，公众围绕“中国物流成本缘何居高不下”的问题展开讨论，其热度已经达至沸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18%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过高的物流成本导致中国的很多商品价格畸高，一个“经典”的案列是：西葫芦在山东产地的价格是5分钱一斤，但运到北京社区菜市场后，就变成1元钱一斤，价格上涨近20倍。

一边是老百姓腰包里的收入增长缓慢，一边是菜篮子中的物价急剧攀升，老百姓因此节衣缩食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通胀压力下的民生焦虑由此可见一斑。进一步拓宽视野则可以看到，各行各业的人们，要么为产业上游的原材料价格走高而眉蹙，要么为产业下游的销售不景而心忧。导致这一切的缘由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物流成本实在太高，已经成为全社会不堪承受之重。甚至可以断言，物流成本畸高对物价攀升的“贡献”以及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要比所谓的“输入型通胀”严重得多。扩大内需是中国当前经济的战略性任务，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应有之义，也是助力“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举措。

为此，政府开始着力增加居民收入，并下决心推进以公平为取向的分配制度改革。从去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与此同时，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凡此种种，的确令人欣慰。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已然实施或在议的为居民增加收入的举措，远不如降低畸高的物流成本来得实在。

在此，不妨将提高个税起征点与降低物流成本对促进内需的作用做一个比较。根据前不久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我国的个税起征点（个税免征额）拟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与此同时，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拟由现行的9级减少为7级。据财政部测算，该草案如果得以实施，个税征收这一块的国家财政收入每年将减少1200亿元，换言之，纳税人即居民的购买力每年将因政府“让利”而增加1200亿元。这无疑将对提振内需产生积极效果。

然而，和降低物流成本带来的社会购买力增量相比，1200亿元这个数字几乎不值一提。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测算，如果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18%下降到发达国家9%的水平，每年就能够“节省”出近3.6万亿元（以2010年中国39.7万亿GDP为基数）；再保守一些，如果能下降到12%的水平，每年也能够“节省”出将近2.4万亿元。从理论上讲，这2.4万亿元中的绝大部分，都可以转化为新增加的居民购买力。

降低物流成本还能提振中国资本市场，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为，A股的众多上市公司也是物流成本畸高的受害者。如果物流成本能够切实有效地降低，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无疑将得到极大的改善，从而刺激其市值和股价提升，1亿多A股投资者的财富总量也将因此增加。而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转化为居民生活消费开支的，根据常识判断，这笔钱的总量将非常可观，它对于内需的拉动也会相当给力。

此外，物流成本如果大幅降低，与老百姓衣食住行相关的一系列商品就会变得更加便宜，这将极大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由此可见，有效降低物流成本至少能够收到一举三得的功效，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不过，在政府当前的施政侧重点上，相比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个税起征点被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与新华网网友交流时表示，政府将把提高个税起征点作为年内改善民生的第一件实事。以此为契机，提高个税起征点进入政府议事日程，并得以扎实推进。而早在2009年3月，国务院就颁布了《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针对物流成本过高等问题，提出“继续深化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货

代等领域的体制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消除地区封锁，依法制止和查处滥用行政权力阻碍或限制跨地区、跨行业物流服务的行为”等一系列举措，但时至今日，物流业的高成本顽症并没有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种局面难免让人怀疑，《物流业调整与振兴规划》也许是金融危机期间鼓舞士气的一个应急式的空头文件，一俟金融危机过去和GDP“探入”任务完成，有关部门就将其束之高阁了。

提高个税起征点，固然是民生所期待的善举；降低物流成本，则更是民生所关切的良治。目前在施政时间表上，提高个税起征点之所以能够抢先一步，也许是基于决策者“先易后难”的操作考量，毕竟，降低物流成本牵涉体制顽疾与众多既得利益群体，面临较大的变革阻力。但是，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降低物流成本这一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都值得决策者不惜代价地竭力达成。

以条块分割、雁过拔毛为特征的“实路钱经济”和“进场费经济”，是阻碍中国物流行业经脉畅通的“毒瘤”。往轻一点说，它具有特权经济的弊端；往重一点说，它感染了封建割据经济的病毒。从中我们看到了罔顾全局的部门本位主义横刀立马，看到了潜规则生存谋略大行其道，看到了一些失职公仆对民生的极度冷漠，也看到了权力寻租的种种伎俩。这一“毒瘤”为害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已久，是时候对它进行着手切除了！

专家论道 | In-depth Comment |

## 人民币国际化欲速则不达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拔苗助长”。基于经济实力成长而提升国际金融分工地位，只是超级新兴经济货币国际化的动因之一。在金融市场体系尚未发育成熟之前，在金融监管水平尚待进一步提高之前，通过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而提速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会获得一些“红利”，但最终可能过犹不及。

章玉贵

最近一段时期，关于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在操作层面还是舆论层面都有加速推进的趋势。央行在2011年1号文件《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即明确支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可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被媒体普遍解读为央行力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此前，监管机构将可用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的出口商数量由试点初期的365家扩展至67724家；今年一季度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3603亿元，已经占到去年业务总量5063亿元的70%；金砖国家已经表示将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和贷款的业务规模，服务金砖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以规避贸易中使用美元带来的汇率风险和成本；作为亚洲主要经济体，中日韩三国财长日前已同意就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相互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展开可行性研究；急于在上海国际板上市的汇丰银行日前更是发布调查报告，称人民币预期将首次超越英镑，成为全球贸易企业在未来半年考虑采用的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还有一项听起来有点离谱的统计研究，称人民币已取代日元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至于舆论层面，除了不少媒体鼓吹人民币应该加快国际化步伐之外，连中投副总理兼首席投资官谢平，日前也呼吁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列举了加快这一进程的诸多好处。

无法回避的美元高墙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舆论环境的确有所改善。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在内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高官都在不同场合呼吁实现全球货币体系现代化，以便能够涵盖多个主要货币。甚至过去在人民币问题上喜欢向中国发难的美国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也呼吁美国接受人民币可能成为全球性货币的事实，并要加速这个过程。

不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如果没有主要玩家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充其量只是一部分国家的“自娱自乐”。因此，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更要关注国际约束条件。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尽管可以加快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也可能拿到一点国际化“红利”。但并不意味可以获得相应的金融话语权，进而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美国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决不会轻易让中国发展成为国际金融大国。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握有世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要遭到他的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

尽管盖特纳依然认为全球货币体系在未来10至20年内不太可能出现重大变动。但在一向特别重视趋势变迁的美国战略家看来，将来真正能够动摇美元地位的，是越来越受国际瞩目的人民币。尽管人民币目前连区域性的国际货币都算不上，日前也呼吁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列举了加快这一进程的诸多好处。

国际化是内生发育过程

对刚刚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台阶且一直苦于没有国际化货币杠杆的中国来说，人民币如果能够尽快国际化进而成为比肩美元和欧元的世界三大货币之一，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全面崛起，同时也可为中国参与国际顶层金融分工提供实质性支撑。正因如此，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是国内问题，更是国际话题，是关系到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洗牌的头等大事之一。

只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既不能过于保守，也不能“拔苗助长”。因为按照中央的理想，人民币国际化并非简单的可兑换，而是有很高的标准和层级。首先是可替换；二是要全功能的，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备；三要大比例，即在国际货币体系与贸易与投资结算中要有足够的分量。笔者认为，人民币迟早会加入由美元、欧元、日本和英镑等主要货币组成的特别提款权(SDR)俱乐部，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这不能简单地靠政府和舆论的推动，而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发育过程。因为从英镑和美元的路径演变来看，基于经济实力提升而寻求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只是货币国际化的动因之一。

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以及高水准的金融监管机制，才是支撑货币国际化的内生性条件。

在既有的约束框架下，中国的现实追求应该是：如何以经济和贸易实力为基础，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国内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建设。的确，在极为重要的利率市场化时间尚未明确之前，在主要商业银行的行为并不“市场”或暂时无法真正“市场”之前，在真正可以比肩高盛、大小摩以及花旗、汇丰的超级金融机构尚未出炉之前，在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法律体系仍有待完善之前，在从监管层到操盘手的风险管控意识与监管水准依然难令国人放心之前，在金融主导国的实力下降需要下一次大规模的金融事件引爆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宁可谨慎一点，也不要盲目推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直言不讳 | Call a Spade a Spade |

## 财政收入有没有增长极限？

晏扬

财政部5月11日发布数据，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0082.06亿元，同比增长27.2%，这是全国财政收入继今年1月之后再次单月突破1亿元。1至4月全国财政收入36207.8亿元，增长31.4%，其中累计个税收入2540.11亿元，已完成全年预算任务的81.4%。

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477亿元，同比增长11.7%；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同比增长21.3%；2011年前4个月财政收入增长31.4%，按照专家估计，今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将不在话下。财政收入总量直线上升，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绝大多数民众的收入增长缓慢，内需不振，中小企业步履维艰、生存困难，所谓“向追求‘国强’向追求‘民富’转变、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仍然更多的停留在口头上，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面对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人们呼吁政府“多予少取”。“少取”显然是一种奢望，“多予”看上去正在发力，比如今年1至4月全国财政支出25358.02亿元，同比增长27.4%。但是，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增加的支出有多少真正落

到老百姓头上，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认为“少取”优于“多予”。政府将一部分国民收入收上来，用于维持政府运转，用于收入再分配，应当而且必要。但是，政府收入占比不能太大，收入总量不能无限制。一方面，政府手里太有钱，“取之于民”可能大量“用之于官”，可能被铺张浪费、贪污腐败掉，或者被填进低效率重复投资的无底洞；另一方面，在“用之于民”的过程中也会存在跑冒滴漏，并同样存在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收入再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如此，还不如“少取”，少收费，将更多的国民收入留在民间。至于调节收入分配，政府将钱收上来进行二次分配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制度改革，促进一次分配趋于公平合理。

而当政府收入较为丰盛、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财政支出就应当“量出为入”，或实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公共财政。在去年8月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就提出过“合理确定政府性收入总规模”的建议。无论如何，政府收入长期高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这个怪圈必须打破。



美元走强原油暴跌

原油暴跌又惊魂，期市多头真郁闷。市场惶惶寻魁首，众口汹汹指库存。这边商品丢魂魄，那头美元长精神。投资像玩跷跷板，善于应变是牛人。

赵乃育/图 孙勇/诗

经济时评 | Hot Topic |

## 破解“电荒”的金融之策

夏志琼

近期市场不断发出警告，“电荒”可能再度大面积来袭。随着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电力供应形势将会更加严峻。发改委最近下发的通知也印证了这个判断。为确保重要行业、重要领域用电，今年夏季可能有更多的地区出现拉闸限电。

电力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经济增长，到去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高达9.62亿千瓦，已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二位。但让人尴尬的是，无论电力规模如何扩大，增长速度如何赶超，依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导致“电荒”问题层出不穷。总结何在？在于有限的电力增长与粗放发展方式对资源、能源无限索取的矛盾。

细究当前用电量的激增，高耗能产业可谓罪魁祸首。数据显示，一季度浙江省的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5%。其中化工、有色金属制造等高耗能产业的增幅更是高达20%。这说明大量增

加的用电量很大一部分是被高耗能的产业消耗了。同时，各地大跃进式的基础建设过多，也占用了过多的电力产能。

要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的长远目标任务，必须从金融服务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入手，2009年12月23日央行、银监会等四部门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服务支持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指导意见》被看作是金融服务支持产业结构调整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2010年5月28日，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就银行系统全力支持节能减排工作，促进淘汰落后产能，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这两份《意见》吹响了银行业支持节能减排、发展绿色信贷的“集结号”，对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绿色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十年我国新能源投资将达5万亿元。这一规划重点支持的领域集中在风能、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水能、煤炭的清净化利用、

智能电网等七大方面。因此，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光靠政府的投资和补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借助金融手段解决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

一是在产业政策上加强引导。化解“电荒”，金融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既是宣传减排和践行低碳经济的实践者，又是发展低碳、绿色经济的积极推动者，担负着社会与政治双重责任。确保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是要把央行和银监会的决策部署及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把信贷管理责任制落到实处。必须严格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对于违规发放的贷款，必须依法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二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政策优势。政策性银行要以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贷款贴息等方式，加大对新能源产业的信贷支持，以弥补新能源基础项目长期建设过

程中信贷缺口的问题。政策性银行还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银行进行政策性担保等措施，将资金引向技术可行和有市场前景的新能源产业项目上。

三是加大商业银行对新能源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商业银行要贯彻和实施国家的新能源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积极扶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结合市场实际建立分阶段经营策略和经营目标，准确把握不同新能源行业领域的发展阶段，并且根据地区特点，选择本区域具有优势的新能源行业，稳步拓展新能源领域的信贷支持范围。

四是完善和创新多层次的融资渠道。支持承担国家重点节能工程项目的企业多渠道筹措节能减排资金，包括支持企业以发行企业债券、配股、募集新股等形式筹集资金。支持和培育一批具有技术创新、效益增长的循环经济发展项目的中小企业上市，包括在创业板的上市，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可以通过碳交易市场的衍生产品进行现货、期货等产品的买卖，以增加投资渠道和对冲投资风险。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